彭真在1989年中共「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活動*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共建政以來遭遇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機，學生、民眾群集表達對其統治的不滿，中共最後決定動用武力壓制。彭眞是中共元老級的政治人物，他在此一事件中的角色問題，中共出版的官方傳記對於敏感環節多予迴避，西方學界和相關著作則無甚了解。彭眞在事發之時雖然已無任何黨政要職，但並沒有缺席，而是努力協助中央處理相關事態，也發揮重要影響。彭眞在此事發展過程中的態度，其實存在微妙的變化。他一度支持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的溫和與對話方針，但在鄧小平決定戒嚴後改變立場，並且認爲繼續堅持己見的趙紫陽失職犯錯。其後，彭眞憑藉其多年累積的黨內聲望和資歷，以及先前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影響力，完成中央使命：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成員，使之放棄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討論當前政治焦點問題的計畫。彭眞成功的政治遊說，讓中共中央得以排除可能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治干擾，更加緊握處理學潮示威的主導權和機動性。彭眞的相關作爲雖有助中共維繫政權，但也扼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難得嘗試展現自主性的機會。

關鍵詞：彭眞、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趙紫陽

* * *

* 作者特別感謝曾對本文惠予指導與支持的中國大陸和海外研究人員。其中包括日前去世的哈佛大學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在此表達對之的追思和感念。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另外，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人的評論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5-2628-H-004-006-MY2)。

DOI：10.30389/MCS.201903_62(1).0001

壹、前言

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歷史地位和政治資歷，彭眞可與鄧小平、陳雲相互媲美。彭眞在 1945 年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獲選中央委員，在中共中央七屆一中全會進入中央政治局。彭眞進入政治局的時間雖然晚於陳雲，但是兩人在中共「七大」結束不久，同時被毛澤東推薦爲中共當時實際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地位僅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之後。直至十年後，鄧小平才在 1955 年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成爲政治局委員。1956 年中共「八大」的權力安排，陳雲和鄧小平被選入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彭眞失之交臂，但也在新設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內，擔任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副手。陳雲因爲在經濟問題上與毛澤東多有歧異，在 1962 年以後淡出政治；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彭眞的政治聲勢急遽看漲，直逼鄧小平；毛澤東也一度表現出信任、重用彭眞的程度，猶超過鄧小平的情況（鍾延麟 2018, 16-17）。

「文革」後彭眞復出政壇，已是 1978 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雖迅速重返政治局，但在陳雲極力反對、鄧小平也不樂見的情況下，無法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鍾延麟 2016, 133;《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52）。彭眞在現實的政治權位安排中，雖不若「兩個半」—鄧小平、陳雲和地位較次一級的李先念，但仍可與聞最高決策和大政方針。彭眞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用心認眞（1979 年至 1983 年，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3 年至 1988 年，出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及對中共法制建設的初具建樹（包括修憲和立法），使之在政治上另添聲譽。

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人員的近身觀察，在 1987 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遭到罷免之前，在中共的「政治地位」、「權力分量」或「影響力」上，最高的兩人是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和陳雲（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一書記），其次是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和胡耀邦（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其次是趙紫陽（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和彭眞。亦即彭眞是中共政壇最有權勢的六人之一。楊尙昆（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薄一波（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和王震（中顧委副主任）等黨國元老，還在彭眞之後（吳稼祥 2002, 295-296）。

彭眞在 1987 年秋的中共「十三大」離開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並在 1988 年

春任滿卸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一職。事隔僅約一年，中共首都北京市的天安門廣場出現學生示威，多日不散，造成中共政權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機；最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下令動用武力鎮壓和驅散民衆清場，史稱 1989 年「天安門事件」。

關於彭眞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問題，中共官方編寫的《彭眞傳》和《彭眞傳略》雖有提及，但有關敘述和段落甚爲簡略，主要強調彭眞憂心忡忡，聽從中央。對於重要問題和敏感環節，例如：在天安門學潮發展的過程中，彭眞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之間的觀點異同和政治互動；彭眞與鄧小平爲首的元老聚會晤談內容爲何、有何決定；彭眞出面找人談話，在事件全局發展中的意義和影響。多有所迴避（《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 2007, 385-386;《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1640-1644）。海外關於彭眞以至中共歷史和政治的著作，對於彭眞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作爲和活動，敘事更是簡陋，認識嚴重不足（Potter 2003, 6, 135-136）。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彭眞在 1989 年中共首都爆發大規模學生抗議之時，其政治態度和行動爲何？主要的政治考量和權衡又爲何？彭眞在其中的作爲如何有助鄧小平主導的中共中央化險爲夷，對於事態演變和長遠發展又造成什麼影響？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彭眞在「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前已卸下黨政要職，但他對於天安門抗議活動並不袖手旁觀而是緊密關切。彭眞對於學潮的反應和主張，並非簡單的粗暴以對，在事發初期一度與趙紫陽較爲相近；但是在情勢僵持不下、鄧小平表露從嚴處置的決心後，彭眞隨之調整立場，支持實行戒嚴和改換中央總書記；其後，彭眞更利用其政治資歷、威信和手腕，代表黨中央出面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內部醞釀利用人大機制處理當前政治爭論的聲浪，從而爲以鄧爲首的中央逕自採取強硬手段清除示威活動，減少不小的政治束縛和阻力。彭眞的有關作爲雖然有助維持中共的領導和統治，卻也犧牲其過去努力提振、稍見起色的全國人大機構的自主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和重建彭眞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的政治意向、角色和影響，希冀增進對彭眞個人晚年政治活動的了解，並對認識中共「改革開放」早期高層菁英關係和以元老爲中心的政治運作，以至 1989 年天安門危機的政治史有所裨益。

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日記、回憶資料、訪談資料，①以及

註①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爲重要的補充。爲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以甲、乙、丙…等代號名之，另外加上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相關主題的研究著作。②本文的章節安排，在前言之後，依序介紹彭眞在 1989 年北京出現抗爭以前的黨內政治關係和影響、他在「天安門事件」各個階段的態度、變化和原因、其如何與聞黨中央最高決策和協助處理政治危機，最後在結論簡要探討彭眞在事件過程中的有關言行對中共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以及他在事後的政治獲益和動向。

貳、彭眞在「天安門事件」之前的政治關係和影響

彭眞雖然在中共「十三大」「全退」，但因爲有強大、深厚的政治關係網絡，仍退而不休，具有重要的政治能量。

一、彭眞與鄧小平保持不錯的政治關係，鄧小平繼續重視彭眞的意見主張和政治影響。彭眞在掌管全國人大常委會期間，盡責盡心地配合鄧小平的主要政治思路。在堅守「四項基本原則」（堅守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彭眞銜鄧之命將之載入憲法前言，也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講壇，呼應鄧小平提出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與彭眞皆認定胡耀邦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不力，並聯同其他元老齊力逼之辭退中央總書記職位（Chung 2019, 89-122）。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彭眞在全國人大立法工作上予以配合、從旁呼應；在經濟特區一事上，不像陳雲、李先念的消極以至暗中抵制，彭眞如同王震對之公開肯定，也實地造訪打氣。雖然在農業包產到戶問題上，彭眞在「文革」前與「文革」後都不表認同，但他保留意見而未公然質疑和批評。鄧小平熟知彭眞的政法管理專長，彭眞也不失所望地肩挑起中央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也具體貫徹執行鄧小平發起的「嚴打」運動。

另外，彭眞配合鄧小平在「十三大」的「一人全退、三人半退」的人事安排—彭眞卸下所有黨政職務，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皆退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鄧續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和李先念分任中顧委主任和政協主席（趙紫陽 2009, 252）。

註② 從事中共歷史研究，尤其是事涉其官方感到敏感的重大歷史議題和重要人物評價，最經常遇到的困難即是：政治嚴格控管下造成的資料缺乏困境。本文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盡可能地蒐集、綜合、比較和使用各類文獻，也注意和承認各種資料本身可能的問題、不足和傾向性。作者亦強調：本文倚重現有可得資料所做出的學術判斷，自有侷限性，有待日後其他重要文獻面世，再予進一步地檢驗和修改。

彭眞也堅持主張鄧小平繼續留任（《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1620）。鄧小平應該頗爲滿意。

彭眞在「十三大」以後仍然關心國事，將地方視察後的心得感想呈報鄧小平。鄧小平對彭眞的政策建議頗爲稱許，也找彭眞面談（《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1634）。鄧小平看重彭眞的歷史地位和政治勳業，深知其政治能力、能耐和豐富閱歷經驗，可以作爲諮詢對象。事實上，從 1989 年鄧小平處理「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中，即可見到他召集彭眞與會共商國是，而非簡單視之爲一名退休人士而已。

其他的政壇元老如王震（1988 年 4 月，他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獲選爲國家副主席），也繼續重視彭眞、爭取其支持（《王震傳》編寫組編 2001, 282）。

二、「十三大」以後的中共「一線」領導人，對彭眞仍甚爲尊重、不敢小覷。中共「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和姚依林組成。在中共「一線」的權力布局是：趙紫陽出任中央總書記、李鵬、姚依林擔任國務院正副總理、胡啓立作爲中央書記處（較諸先前，此一機構的地位已從管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被降爲黨中央的辦事機構）排名首位的書記，喬石作爲第二位的書記處書記並兼任中紀委書記。另外，中央常委以外，就屬萬里最爲引人注目，他在黨內是政治局委員，在國家職位上是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下簡要介紹彭眞和趙紫陽、李鵬與萬里的政治關係和互動。

彭眞與趙紫陽。趙紫陽在歷史上曾在鄧小平的指揮之下。中共建政以後到「文革」之前，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彭眞在「文革」前負責協助管理中央日常工作，經常代表中央與地方聯繫並施加指導，應已對趙紫陽個人和其工作能力有所認識。1980 年代，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彭眞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兩人「關係不錯」。在全國人大的立法和審議預算問題上，趙紫陽盡量滿足「革命老前輩」彭眞的面子和需求；彭眞爲了在法律上提供趙紫陽推展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主動性和便利性，他與趙紫陽磋商後，提出授權國務院就經濟工作需要先行制定條例，之後再由全國人大訂定正式法律。此舉實質擴大國務院的立法權，讓趙紫陽的經濟管理工作另添有效的法律手段（俞梅蓀 2005, 141-143）。

彭眞確定在中共「十三大」離退，趙紫陽對彭眞的諸多政治動作，讓後者感到欣慰和感受尊重。趙紫陽評論「六屆人大工作有口皆碑」，讓彭眞甚是高興（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5 年 8 月）；1987 年 11 月 2 日，趙紫陽在十三屆一中全會結束時的講話中，除了較爲人知地提到：「小平同志作爲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沒有改變，我們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繼續在重大關

頭掌舵」，「今後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志仍然可以召集我們開會」。趙紫陽在同一講話中還表示：「我們黨的第一代革命家」慶幸都健在，「他們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的財富，我們仍然能夠得到他們的指教和幫助」。趙紫陽並直接唱名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還有彭眞（趙紫陽 2016a, 181）。

趙紫陽此後繼續將重要的政策文件（例如：其主導制定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善用中國豐沛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與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擴大結合），送給彭眞審閱，也高興地宣稱獲得其支持（趙紫陽 2016b, 277-278）。趙紫陽對於彭眞退休後提出的政策書面建議，加以肯定並指示印發上層傳閱、研究（《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37）。

彭眞與李鵬。李鵬是中共烈士李碩勳之後，李鵬雖然澄清他非周恩來的養子，但是他成長過程中確實與周恩來、鄧穎超多有互動、關係匪淺。「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的資深領導人有意在具有「紅色血統」的年輕一輩中進行挑選和培養。李鵬學有專業，也有多年實際工作的經驗，鄧小平、陳雲、聶榮臻等都念及李鵬作爲戰友遺孤的身分，鄧穎超在政治上更對之多有眷顧、不吝提攜。在有大老長輩的庇護和拔擢之下，李鵬政治地位迅速竄升。1987 年夏，鄧小平認爲李鵬相較於姚依林，知識面較寬、比較年輕，決定由李鵬接替趙紫陽的總理職位。陳雲、李先念對此都非常支持。

彭眞對於本身爲烈士後人、又享有主要元老支持的李鵬，自是肯定和推舉。1987 年 11 月，彭眞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3 次會議上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爲，趙紫陽總理推薦李鵬副總理任國務院代總理是適當的。李鵬同志是可以勝任這個重任的。相信他在擔任代總理職務期間，能夠領導國務院認眞負責地貫徹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16）

彭眞與萬里。萬里在歷史上屬於鄧小平的部屬。1958 年萬里從國務院城市建設部部長調任彭眞麾下的北京市工作，其權位排序一直居於第四（彭眞、劉仁和鄭天翔之後），難免不平（鍾延麟 2015, 133-134）；彭眞在 1979 年重返政壇後，他與萬里之間對北京市的人事安排問題也易有歧異（閻淮 2017, 190）。中共在醞釀「十三大」高層人事時，鄧小平原擬要萬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遭多人反對而作罷；鄧小平轉而提出要萬里接替彭眞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料又遭到各方反對。鄧小平指示萬里主動拜訪一些「老人家」，自我批評以取得諒解，萬里也遵旨辦理。根據訪談所得，彭眞亦在反對萬里之列，萬里也拜訪彭眞以示意（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5 年 8 月）。萬里最後在 1988 年 4 月順

利走馬上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參、首都學潮爆發至鄧小平決定戒嚴以前

一、「四二六社論」後的彭真動向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病逝。北京高校學生同情胡耀邦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對待、抑鬱而終，以及對中共推行「改革開放」緩進遲滯、幅度有限感到不耐，並且對改革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公不義現象強烈不滿。他們先在校園、繼而以天安門廣場爲主要場域，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時，也對中共治理不彰表達抗議，提出改進、革新的要求。

趙紫陽站在中央「一線」的中心位置，責無旁貸地負責領導應變天安門的特殊事態。趙紫陽認爲學生本意善良，政府不要干涉其悼念胡耀邦的活動。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以後，趙紫陽認爲學生抗議朝著趨緩的方向發展，按既定規劃在 23 日出訪北韓。趙氏在臨行前交代李鵬：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要恢復秩序和復課。想不到的是，4 月 24 日夜，李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對學潮的報告，並加以論斷：「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4 月 25 日，李鵬將這種對學潮極其負面的看法向鄧小平報告。

鄧小平向來對學生、知識分子帶有自主性的政治發聲，高度警惕；他敏感的政治神經、特別是深植內心的階級鬥爭思維，也不時因其眼見或聽聞可能傷及共黨領導的人事物而一觸即發。鄧小平聆聽李鵬的報告以後，即針對天安門的學生遊行驟下斷語：「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一場動亂，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宗鳳鳴記述 2007, 50-51）

根據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講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 4 月 26 日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通稱「四二六社論」），公開宣示中共中央對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強硬立場，特別是將之定性爲「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該社論登出後，不但沒有收到嚇止學生的效果，反而進一步激起學生的反感，在 4 月 27 日出現更大規模的遊行。

黨國元老對首都天安門事態保持高度關注。陳雲在杭州收到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講話後，即注意到其重要性，並交付同在當地休養的高幹閱讀（鄧力群 2006, 498）。在北京住院療養的李先念，事後自言：「我聽完秘書的匯報（「四二六社論」）後，當即給小平同志打了個電話，支持堅決平息動亂，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盡快採取有力措施來平息北京的事態。」（《李先念傳》編寫組編 2009, 1355）趙紫陽後來回憶當時的聽聞：「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趙紫陽 2009, 46）

彭眞正在北京，對相關動態也特爲關心並加以獻策。根據李鵬的記述，彭眞向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提出三點意見，後者在 4 月 29 日向李鵬轉達。彭眞的意見是：「一、中央方針和決策是正確的。二、27 日戰術上失敗，學生提出口號，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張剛華 2010, 103）對之加以分析可以注意到：

第一、由鄧小平實際掌控的中共中央，藉由「四二六社論」表達官方立場以後，向來忠心聽命黨中央的彭眞，不令人意外地，自是透過渠道表態支持。第二、從彭眞對截至斯時的學潮的觀察：「要承認 27 日的大遊行學生是占了上風，原因是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機關幹部的支持」（張剛華 2010, 104-105），反映其對天安門情勢發展的準確掌握。事實上，彭眞住處位於台基廠，離天安門不遠；其住所更直接靠近中共北京市委員會。彭眞在「文革」前長期擔任北京市黨政最高首長，在北京市的幹部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也與市領導保持極爲密切的關係。根據訪問所得，北京市的領導人在「天安門事件」發展期間，經常前去彭眞家向之報告相關情況（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北京，2015 年 8 月）。這既滿足彭眞對局勢高度關注的需要，也顯示北京市委對其「老首長」的尊重，甚至希望從之獲取有效的政策建議。

第三、彭眞經由何東昌向李鵬提出的建議—「目前黨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壞人，讓廣大群衆認清動亂的眞面目」（張剛華 2010, 104-105），乃將居於大多數的示威學生、民衆和所謂潛藏其中、居於少數的意圖不善者，加以區隔和對待，並且建議採行暴露後者敵意、惡行的方式，以引導善誘多數本意單純的群衆。彭眞建議的對策比較屬於曝敵行蹤、導正視聽的「文鬥」，而與李先念、王震動輒主張驅逐抓人的「武鬥」，有明顯的差異。這可能與彭眞早年曾參與指揮學生運動、中共建政以後也多年過問首都高校管理的豐富經驗相關。

趙紫陽晚年回憶時指出：不同於李先念、王震，彭眞在學潮的這一階段數次致

電中共中央辦公廳，呼籲中央對學潮要克制以對、勿加動武：

>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爲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眞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趙紫陽 2009, 46）。

根據訪談所得，彭眞向中央辦公廳表達意見時，甚至引述毛澤東所言：凡是鎮壓學生者，都沒有好下場（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北京，2016 年 7 月）。

二、趙紫陽「亞銀講話」後的彭真動向

趙紫陽結束對北韓的訪問後，4 月 30 日回到北京。他覺得李鵬處理學潮的做法、特別是「四二六社論」的形成和刊登，不利於學潮問題的解決，甚至得到適得其反的結果。趙紫陽便想利用他對外講話的機會緩和政治氣氛，進而將對學潮的處理導入一個比較穩妥可行的方向。5 月 4 日，趙紫陽對亞洲開發銀行會議重要與會人士的講話（簡稱「亞銀講話」），就較善意地看待參加抗議的學生：

> 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

趙紫陽強調：「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針對學生提出的改革要求，趙紫陽表示：「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針對各界最爲關心的貪污腐敗問題，他提出要採取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公開化和透明度的措施。另外，針對如何處理學生遊行的問題，趙紫陽表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王敬德 1989）。

趙紫陽除了透過公開喊話減輕學生疑慮、與之拉近距離，他也與萬里交換意見，希冀其領導的全國人大可以在廉政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和透明度，以及制定法律等多方面積極行動，藉此盡快處理民怨最集中的熱點議題，緩和學潮熱度；另外，順勢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讓全國人大眞正「發揮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萬里表示贊同，其主持的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進而決定 6 月 20 日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並將相關問題列入議程（趙紫陽 2009, 53-54）。

趙紫陽發表「亞銀講話」後，根據其觀察：在中央常委會內，胡啓立、喬石贊成他倡議的處理學運新方針；李鵬、姚依林則持反對意見。中央常委會擴大舉行時的經常列席者，除了萬里完全同意新方針，經常扮演鄧小平的代言人的楊尙昆，對學潮的處理態度也是較爲溫和（趙紫陽 2009, 52）。

至於鄧小平以外的重要政治元老，有論者指稱李先念聞知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後，致電鄧小平表示「中央有兩種聲音」；陳雲也傳話、提醒鄧小平要注意趙氏的此一講話（楊繼繩 2010, 340）。相對於李先念和陳雲的負面看法，趙紫陽感到印象深刻、正面好感的是彭眞對之的支持態度。趙紫陽回憶：「楊（尙昆）還告訴我，他同彭眞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趙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趙紫陽 2009, 52）2004 年 3 月，趙紫陽去世前約十個月接受來者提問時表示：「應該說楊尙昆在鄧小平決定戒嚴之前，是支持我趙紫陽的」；他並強調：「我告訴你，彭眞當時以前也是支持我的」。③

趙紫陽晚年著重強調彭眞在 1989 年 5 月上旬對之的支持，卻全然不見於彭眞的官方傳記和年譜。這恐不是趙紫陽捏造事實，而更可能是中共官方的彭眞著作基於「忠奸」、「正邪」不兩立的政治立場，所不欲面對和處理的敏感環節。如此反而錯失突顯彭眞斯時一度欲溫和處理學潮的言行痕跡。

1989 年 5 月上旬，趙紫陽嘗試推行不同於「四二六社論」的新方針，雖然獲得彭眞在內等人的響應，但是卻遭遇了推進困難、兩面不討好的局面。在天安門聚集的學生和對之同情的民衆，對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反應頗佳，愈加要求中央政府重議「四二六社論」；學生之間也出現分流以至部分激化的情況，5 月 13 日，學生開始進行絕食，藉以加大對政府的施壓。李鵬爲代表的黨內力量，刻意將學生

註③ 請參閱：〈解密時刻：趙紫陽最後的歲月（完整版）（上）〉，YouTube，https://av.voanews.com/Videoroot/Pangeavideo/2012/07/4/48/48c5e527-ac6b-4e96-96b6-5bb40d3be290.mp4.（其中 13 分 30 至 35 秒處）

的高聲訴求和激昂舉動，放大、扭曲解讀成不可理喻、存心搗亂，意圖以走偏鋒的方式達到反政府的目的，據此證明「四二六社論」的正確和必要。

在這一愈趨緊繃的對立過程中，趙紫陽可資運用的政治空間和時間快速流失：學潮沒退，顯得其溫和方針未能奏效；學生斷食又實同迫之必須盡速回應。李鵬以學潮轉激爲由，反譏趙紫陽的溫和方針不切實際，也試圖藉此繼續強化鄧小平對學潮的敵對意識，從而壓縮趙紫陽調整政策的餘地。

5 月 16 日上午，中顧委委員李昌找趙紫陽談論天安門問題，提出由趙紫陽、李鵬出面與學生對話以緩解矛盾。李昌回憶趙紫陽在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對運動的定性，他想淡化，即不要把運動的性質說死，不然學生轉不過彎」；但是「常委通不過」，「這個問題要小平同志說話」（范泓 2008, 187）。同日晚上，趙紫陽主持中共中央常委會，正式提出「四二六社論」對學潮定性不恰當、需要修改，他也願意承擔此一政策轉彎的政治責任。李鵬當場與趙紫陽爭執，焦點集中在「四二六社論」是否爲鄧小平的本意，以及其對當下學潮性質的判斷是否符合實際。趙、李兩人爭論相持不下，都企望鄧小平出面裁決。

肆、彭眞對首都戒嚴、撤換總書記決策過程的與聞

5 月 17 日下午，鄧小平在住處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鄧小平面前，針對是否要更改「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和相應處置方針，會上出現意見交鋒。根據趙紫陽的說法，李鵬、姚依林不但繼續堅持對學潮強硬以對，他倆對其「亞銀講話」批評之激烈，也超乎趙氏的意料。中央常委僅有胡啓立明確支持趙紫陽的立場。原先傾向趙紫陽立場的楊尙昆，這時竟也大爲轉向，甚至提出戒嚴的政治選項。

最關鍵的是，鄧小平不利趙紫陽的鮮明表態和對戒嚴決策的一錘定音。對於趙紫陽在 5 月 16 日與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會面時，公開提到鄧小平實際上是中共最高掌舵者一事，鄧小平恐已極爲惱怒，將趙氏的此一言行解讀爲把當前天安門的政治僵局歸咎於他；5 月 17 日上午，李先念造訪鄧小平，對趙紫陽有所非議（張剛華 2010, 261），可能更進一步地惡化鄧小平對趙氏的政治觀感。鄧小平在同日下午的常委會上，又見趙紫陽對處理學潮不甚堅決、鐵腕，因此他在聆聽趙紫陽的發言時，表現得「很不耐煩，不以爲然」。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要點是：學潮問題的遲未解決，證明「四二六社論」對之定性的正確無誤；黨內高層的分歧

和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實是讓學潮益發不能平息的原因。鄧小平進而決定調動大軍、實行戒嚴（趙紫陽 2009, 61）。趙紫陽無法反對鄧小平的戒嚴決定，但坦言自身在執行上恐不得力；鄧小平立即裁示由李鵬、楊尚昆、喬石負責實施戒嚴。

李鵬欣然支持鄧小平的戒嚴決策，自言「精神爲之一振」；他作爲落實戒嚴的主要負責人，首重向黨國元老告知此事，以爭取後者聲援。5 月 17 日下午的中央常委會議後，李鵬旋即向陳雲爲首的中顧委要員通報。陳雲、李先念、王震聞後皆表示擁護中央決定（楊明偉 2005, 249）。

彭眞是否及時知情鄧小平在 5 月 17 日主導促成的戒嚴決策？有論者指稱鄧小平當日即親自聯絡召集陳雲、李先念和彭眞，並且在 18 日就此開會討論（戴晴 2014）。但此說沒有其他有力的資料佐證。然而，以彭眞與其他資深元老和年輕當政者之間的綿密關係，彭眞應會被加以告知並能掌握此一最新中央政治動態。事實上，楊尚昆在約一週後（5 月 24 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軍級以上幹部參加）上就指出：關於戒嚴決定，有徵求彭眞的意見（高瑜 2009, 135）。另外，恐怕也不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就在 5 月 17 日鄧小平決心戒嚴的當天，彭眞委託女兒傅彥向鄧小平轉達其對處理首都動盪不安局面的意見。彭眞的官方傳記透露的內容是：彭眞強調「人大、國務院、中共中央和同學們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文化革命『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痛苦教訓全國各界人民都是熟悉的，記憶猶新」；彭眞「並詳細列出憲法和刑法有關條文，作爲平息事態的法律依據」（《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1640）。彭眞呈送給鄧小平的意見中，是提出依法可施行戒嚴的建議而與鄧小平不謀而合？抑或是在聞知鄧小平做出戒嚴決策後，爲之提供符合法律的合理化外衣？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顯然地，彭眞已經像楊尚昆一樣，改變了自身原本傾向支持趙紫陽「亞銀講話」的政治主張。

彭眞和楊尚昆爲何會改變立場呢？趙紫陽認爲：「共產黨就有這規矩啊。最高領導一變，大家都得變。」④亦即一旦鄧小平明確表露他的政治立場，「黨性堅強」的彭眞就趕緊跟上。另外，自彭眞看來，在最高領導人表態以後，趙紫陽仍繼續堅持己見、沒有適時調整立場，乃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在黨國存亡的緊要關頭，更是不能寬恕，須予嚴懲。

鄧小平在 5 月 17 日下午召開中央常委會議後，還未全然下定決心罷黜趙紫陽

註④ 請參閱：〈解密時刻：趙紫陽最後的歲月（完整版）（上）〉，YouTube，https://av.voanews.com/Videoroot/Pangeavideo/2012/07/4/48/48c5e527-ac6b-4e96-96b6-5bb40d3be290.mp4.（其中 13 分 20 至 28 秒處）

的中央總書記職位；直到趙紫陽不願執行戒嚴、後續也不肯公開現身表態支持戒嚴，終於讓鄧小平鐵了心意要趙紫陽下台。

5 月 17 日夜的中央常委會議上，趙紫陽再次對戒嚴決策表示異議，李鵬堅稱鄧小平已經決定、無須再議，故堅決不退讓。趙紫陽在會後提交辭職信，經楊尙昆勸說而撤回信件；但他仍在 5 月 18 日致信鄧小平，試圖改變後者的戒嚴決定。以鄧小平決心一下即難扭轉的政治性格，趙紫陽的去信如同石沉大海。

在李鵬等人的安排下，5 月 19 日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規劃召開黨政幹部大會，宣布隔日早上開始戒嚴。趙紫陽臨時接獲會議通知，不願與會爲之背書。根據楊尙昆在 5 月 22 日的講話，趙紫陽不欲出面參與戒嚴部署而以身體不適爲由請病假的情況，彭眞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知曉以後，咸認爲茲事體大，表示「這個問題要到小平那裡去解決」（楊繼繩 2010, 383）。趙紫陽也表示：「我拒絕出席 5 月 19 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趙紫陽 2009, 68）。

5 月 20 日上午，鄧小平在其住所召開會議。中共官方史書雖稱之爲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是中央常委排名第一、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立場與之相近的另一中央常委胡啓立，連開會通知都沒有收到。出席會議者有：尙有官職的元老陳雲、李先念、楊尙昆、王震；中央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沒有一官半職的彭眞也與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4, 1277）。這勢必經過鄧小平的同意，甚至是其主動授意。

鄧小平在會上表示：「問題的根子出在黨中央，是在中央內部。黨內有兩個司令部。中央處理這個問題，發表 4 月 26 日社論，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讓不讓步？不能再讓步了。如果再讓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5, 1801）鄧小平所言的「問題的根子」和「兩個司令部」，無疑就是針對趙紫陽所做的政治指控。根據楊尙昆在 5 月 22 日的說法，陳雲、李先念和彭眞都在此會上批評「太不像話了」，並指出：「問題出在黨內，如果黨內一致，事情不會鬧到這種地步」（楊繼繩 2010, 383）。另外，從楊尙昆在 5 月 24 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到針對「四二六社論」的中央立場，彭眞無異其他政治元老，也認爲「不能往後退，退了就垮臺了」（高瑜 2009, 134）。衆老共議後，在未告知趙紫陽的情況下，即決定拔除其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趙紫陽 2009, 68-69）。

此會的另一重大決定是選擇江澤民擔任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4, 1277）。這主要是基於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三人的共識；包括彭眞在內的其他元老，應不致於有太大的意見。有論者指稱：在選任新的中央總書記的過程

中，彭眞曾提議萬里（張良 2001, 592-593）。但是此一說法值得存疑：一、如前所述，彭眞和萬里的政治關係恐非很好，彭眞對萬里繼之接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都曾有所保留，恐無可能推舉之出任黨的最高職位；二、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其在國外的講話較爲同情學生，稱「現在學生、知識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郭文福 1989），相關言論與趙紫陽相近，而未與鄧小平新定的戒嚴決策、方針緊密一致，其更刺激、鼓舞了中共黨內、社會上和學生間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治期待，認爲它可助於解決當前黨國和社會之間的嚴重對立。自彭眞看來，萬里不但沒有幫忙解決問題，反而是火裡添薪、製造麻煩，自然更不可能向黨中央推薦萬里擔任中央總書記。事實上，鄧小平主政下的黨中央賦予彭眞的主要政治任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收拾萬里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人士在學潮中所捅的「婁子」。

伍、彭眞協助黨中央抑制政治風波（上）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是否提前召開的爭議

5 月中旬以後，面對愈演愈烈的學潮，爲數不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希望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以盡速化解民怨和事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級（總共 19 名），11 位黨外副委員長和非黨組成員的副委員長，皆贊成提前召開人大常委第八次會議，並請萬里中止訪問、立即返國主持會議。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冲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會議，討論後認爲提前召開常委會議「已勢在必行」，最後更以黨組名義向中共中央常委呈送相關內容的請示報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方面，5 月 17 日，胡績偉、江平等 24 位人大常委，也致信中央建議立即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研究當前局勢（張剛華 2010, 213, 176）。

隨著中共中央的戒嚴決策形成並由國務院總理李鵬公開宣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提前召開，除了預定討論學生遊行、廉政革新、開放透明等問題，另外更被賦予一個政治期待和意義：討論、研議政府做出戒嚴決定是否合法、應否被撤銷。這對於極力反對戒嚴、但在黨中央遭到孤立的趙紫陽，猶如「最後一根稻草」。相對地，這對於強烈主張戒嚴、強硬對付學潮的李鵬等，無疑是芒刺在背，甚至無異是一枚政治炸彈—既可能直接衝擊李鵬爲首的政府的威信，也可能破壞鄧小平、黨中央對學潮以至總體政局的控制力。因此，步入 5 月下旬以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爲各方政治角力的競技場；其領導和重要成員，也成爲有關各造重點爭取、經營的對

象。

趙紫陽方面，趙紫陽在 5 月 17 日中央戒嚴決策爭論中未獲鄧小平的支持，政治上實際已「靠邊站」、喪失實權，但他並未全然放棄、坐以待斃。他希望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處理當前的政治僵持局面。彭冲代理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在不久之前向中共中央提交召回萬里、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建議請示，趙紫陽認爲可以一試。5 月 21 日，趙紫陽找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談話，並請他轉告楊尙昆此事的可行性（趙紫陽 2009, 65）。有論者指出：趙紫陽也「讓閻明復找彭眞發電報讓萬里提前回來」（楊繼繩 2010, 379）。如確有其事，可見趙紫陽此時仍對彭眞抱有寄望。如前所述，趙紫陽在 5 月上旬努力調整應對學運的方針政策時，相較其他黨國元老，彭眞和楊尙昆都較爲支持他，因此對彭眞較有好感，此時對之多少仍抱持希望，甚至期望借重其政治威信和影響，助自己放手一搏。

另外，根據趙紫陽的說法：「在這之前，彭冲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眞，彭眞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趙紫陽 2009, 65-66）針對趙紫陽的此一回憶—彭眞曾對彭冲主導的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的倡議表示贊成，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但是無論其確實與否，時至 5 月 21 日及之後，彭眞不但全無可能配合趙紫陽，相反地，彭眞更善用其政治聲望和資歷，特別是其對全國人大的特殊影響，盡心協助鄧小平掌控的黨中央和李鵬爲首的政府，防阻人大常委會提前召開會議，以免其甩開中共中央的領導，自行尋求解決天安門的政治僵局。

李鵬方面，對於彭冲主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建議報告—召回萬里、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李鵬以「外事不變動爲好」而加以回絕（姚依林、喬石亦持同一立場）。5 月 22 日，李鵬、楊尙昆、姚依林和喬石以黨中央名義召集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開會，努力勸說其中部分人員放棄召回萬里、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的主張。李鵬認爲有些收效，而且個別人士反應較好，例如：陳慕華、王漢斌「態度明朗」，廖漢生「有些牢騷，但態度正確」。但是仍有待進一步爭取、勸回的是「看來是同情學生的」彭冲和「情緒比較激動」的葉飛（張剛華 2010, 208-213）。

5 月 23 日，喬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參加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包括非屬中共黨籍者）會議，會上「有的副委員長十分激動，認爲他們提的要求，中央一個也沒有答應。他們強烈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張剛華 2010, 216）。綜前所

言，即便經過李鵬等人的努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內，仍有中共籍和非共籍的副委員長對中央決策思想不通，尚須進一步費心打通。不久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老長官」彭眞，代表中共中央出馬登場救援。

二、彭真出手制止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處理學潮：黨內運作

5 月 23 日上午，陳雲召集彭眞、李先念、王震至其住所談話。彭眞和陳雲在歷史上多有過節，彭眞在「改革開放」時期未能「入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陳雲的堅決反對；兩人在不久以前也對 1945 年至 1946 年的中共東北局歷史問題進行爭論，迫使鄧小平出面叫停（鍾延麟 2016, 134-140）。值此攸關中共可否繼續執政的重大關頭，陳雲、彭眞皆有意將前嫌置諸一旁，共商如何協助黨中央化解天安門抗議帶來的政治危機。

這四位黨國元老的談話內容，可從同日下午陳雲對薄一波的講話探知。陳雲表示：「這個局面不能再退，沒有餘地了。要擁護鄧小平，擁護中央常委。4 月 26 日社論要肯定。如果說這個社論少了一點，就是少講了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話。這個時候，我們老同志不出來講話不行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5, 1801）亦即陳雲、彭眞、李先念、王震咸認爲：當務之急是他們這些「老同志」必須「出來講話」。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上，就是他們分工把口地進行勸說和疏通：陳雲負責其麾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5 月 26 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並發表講話）；李先念負責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5 月 27 日，李先念在全國政協第七屆委員會第 18 次主席會議上發表講話）；彭眞則「回鍋」負責全國人大。如前所述，以當下的政治情勢發展，其中又屬彭眞的工作任務難度最大、也影響最巨。

彭眞「先安內再攘外」，選擇先從中共所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手，規劃召集他們進行「面對面」的座談。彭眞知悉現任副委員長內存在同情學生者，爲了增加自己遊說的力量，首先聯絡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耿飈助陣，耿飈爽快應允。彭眞接著電話聯絡葉飛。葉飛在 5 月 21 日與其他數名中共解放軍上將連同署名、上書中央（詳情後述）；22 日，李鵬等人向中共籍人大副委員長「做工作」時，葉飛也情緒激動。彭眞以全國人大「老上級」身分致電葉飛（第六屆全國人大時，葉飛是彭眞麾下的副委員長）邀約談話，葉飛或不便發抒情緒和直言頂撞，便由其妻代接電話並表示不克出席，彭眞應允並勸慰葉飛好好養病（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彭眞藉此示意葉飛不要再強行

出頭、冒然行動。5 月 24 日，彭眞也親自聯絡其他的中共籍現任副委員長如廖漢生，邀之隔日見面相談。

5 月 25 日上午，彭眞以「受中央委託」的名義在玉泉山舉行座談，召集習仲勳、彭冲、廖漢生、陳慕華，以及彭眞「搬兵」而來的耿飈。會中基本的態勢是第六屆全國人大正副委員長彭眞、耿飈勸說第七屆副委員長，接受中央對學潮的分針和政策，迷途知返、不要自行其是。事實上，在以彭眞爲委員長的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彭冲、廖漢生皆屬副委員長，王漢斌擔任秘書長。在現任副委員長中，彭眞鎖定的重點「輔導」對象，應即是先前主張萬里盡早返國以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對學生也較爲同情的彭冲。

彭眞在座談會上的談話要點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違憲的。這次遊行示威就是動亂。全國人大是代表 11 億人民的，不能服從搞遊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張剛華 2010, 222）。另外，彭眞也強調：政府可以決定對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全國人大只能在政府宣布全國戒嚴才可過問；因此，全國人大不能干涉政府對首都部分地區的戒嚴決定（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

廖漢生、陳慕華、王漢斌本來就傾向支持中央的學潮處理方針，聽了彭眞談話後，自是點頭如搗蒜。廖漢生就自稱「啓發很大」（廖漢生 2003, 535）。彭冲自認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是彭眞的助手，對之甚是尊重。前面曾提及根據趙紫陽回憶：彭冲在 5 月中旬後期醞釀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時，曾特地詢問彭眞。此事若爲眞，正可反映彭冲對彭眞意見的重視。此次在玉泉山，彭眞兼具黨中央和法律權威的雙重身分，直言政府處置學潮辦法的合法和正當，並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憲依法配合行事、不作干預。彭冲在葉飛缺席下已顯得形單影隻，實難以繼續堅持己見。

彭冲的政治轉向顯示彭眞的勸告成功。胡績偉先前曾找彭冲，要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學生對話以解決學潮問題，彭冲將此議向中央高層請示。恐非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就在 5 月 25 日彭眞在玉泉山與彭冲在內的中共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座談的當天下午，胡績偉電話告知其友人：彭冲拒絕其倡議（陳子明 2009, 35）。亦即彭冲已一改先前傾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處理學潮問題上要積極主動、介入的主張，也實同切斷了全國人大常委高層和在學潮前線中奔走、試圖找出妥協方案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之間上下協作的可能性。

既然彭眞已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主要成員「思想打通」，彭冲代理爲首的黨組再由上而下地按組織網絡，召集全國人大所屬的各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上的中共黨員幹部，以及在北京的中共籍的人大常委委員開會，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和彭眞各自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的「談話精神」（廖漢生 2003, 535）。

陸、彭眞協助黨中央抑制政治風波（下）

一、彭真出手制止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處理學潮：針對黨外

5 月 26 日下午，彭眞受中共中央委託，邀請 7 位非屬中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範、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周谷城、嚴濟慈、榮毅仁，前去玉泉山參加其主持的座談會。有論者曾以「中共運作嫻熟的統戰應酬」、「喝杯茶、擺擺花」，形容彭眞出面與黨外人大副委員長座談一事（戴晴 2014）。但實際上已 87 歲的彭眞，對此還是頗費一番工夫。

首先、5 月 24 日下午，彭眞委託閻明復前去拜訪朱學範、周谷城、費孝通、孫起孟，提出近日內將邀請他們連同雷潔瓊、嚴濟慈、榮毅仁一起座談。彭眞也要閻明復轉達其看法和主張：「北京市的形勢很嚴重，實際發生了動亂，已經無法保證正常的秩序，而且波及二十幾個城市。對待這個問題，要求大家一起做工作，希望以事實爲依據，以法律爲準繩，在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47-448）分析彭眞會前「打招呼」的內容，已可見其既認同黨中央對天安門發生事端所作的「動亂」定性，也基於正常秩序無法保證、甚而蔓延多地的判斷，認可戒嚴的需要和合法。

其次、彭眞爲了準備與黨外的人大副委員長交談對話，他事先徵詢爲其熟悉的《人民日報》記者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內的重要助手的意見，將自己口述意見整理成文字，終而形成講話內容（李海文、王燕玲編著 2002, 321）。

彭眞在短時之內做了精心的準備，再加上 5 月 25 日已經與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過一次，他在 26 日針對黨外人大副委員長的座談會上，駕輕就熟地摘引憲法、法律和黨的決議，強調要以之爲準繩來「統一思想」。彭眞講話的要點有：一、按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我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是違憲的，也是違背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黨的主張的」。二、按憲法和刑法，以及北京最近出現的事實情況，首都發生了動亂；但他強調「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三、關於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彭眞強調「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

的」，並表示：既然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絲毫沒有抵觸」憲法和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呢」？

彭眞在說明解釋政府戒嚴之舉如何合憲、合法之後，強調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他並說「有的人嘴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群衆提高警惕」（彭眞 1991, 656-658）。在座的非共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們聞之，還敢繼續對政府處理學潮示威的作爲比手畫腳、說三道四嗎？再堅持下去，恐怕就有被指控「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之虞。

另外，有論者表示：彭眞在會上還指稱「趙紫陽幹了很多壞事，還有一個地下指揮系統」（高瑜 2009, 136）。此說如果爲實，可顯示彭眞向 7 位黨外副委員長通報中共高層內部最新的情況，特別是揭發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是。黨外副委員長既已通過彭眞交心、交底知曉趙紫陽的「爲非作歹」，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如果再和趙紫陽齊聲、唱和，不是可能反遭之利用而擺明與中共中央作對嗎？

彭眞在對這些「高級民主人士」曉以法理和明以利害後，最後反過來要求他們勸說學生和民衆，使之「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

彭眞在 26 日座談會上花費一番唇舌後，參加的黨外副委員長們反應正面，表示認同和支援（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戊君，北京，2015 年 8 月）。彭眞待客周到，之後還請這些友黨人士用餐（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

座談會結束以後，彭眞即派人去向宋平報告情況，並爲後者所稱許（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己君，北京，2016 年 7 月）。另外，彭眞也將其講話資料送交李鵬一份。李鵬先前找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難竟全功；彭眞不但勸服黨內的副委員長、也收服黨外副委員長。李鵬因此大加讚評：「彭眞同志長期主持人大工作，是上屆人大的委員長，主持修改過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文件，在人大很有威信。彭眞同志講話義正嚴詞，很有說服力。」（張剛華 2010, 238）

當彭眞努力勸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內、黨外副委員長之時，天安門抗議學生和民衆寄予厚望的萬里，在 5 月 25 日返回中國大陸，沒有回到北京而是停留上海，更繼而在 5 月 27 日發表書面講話，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和政府的戒嚴決定（人民日報 1989）。

二、彭真參與處理「七上將」上書事件

彭眞協助鄧小平爲首的黨中央，努力解除全國人大系統醞釀的政治危機的同時，他也參與處理中共解放軍上將聯名向中央上書的重要事件。5 月 21 日，張愛萍、葉飛、蕭克、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李聚奎 7 名上將（後來王平上將也加入），聯名致信鄧小平和中央軍委：「鑑於當前事態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以下要求：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絕對不能開槍，絕對不能造成流血事件。爲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要進城。」（楊繼繩 2010, 369）此一軍方資深高級將領的集體表態，立即引起黨內外的高度關注。如何對之進行勸解、使之與中央戒嚴決策保持一致，即成爲與鄧小平站在一起的黨國元老（彭眞在內）的努力目標，這也可能是 5 月 23 日上午陳雲、彭眞、李先念、王震聚會討論的另一重要內容。從具體進行的情況來看，彭眞的政治資歷比李先念和王震還深，而且其政治交涉經驗和手腕也比較高明，因而實質扮演一個重要的勸說角色。如前所述，彭眞除了致電葉飛，要之在家休養，他也參與對陳再道和張愛萍的勸說工作。

5 月 23 日下午，李先念與陳再道談話。李先念開口即質問陳再道爲何發起簽名反對戒嚴，更狐疑趙紫陽是否予之好處，當場激怒後者，不歡而散（《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 2011, 480; 杜導正 2010, 345）。之後改由彭眞出馬。彭眞首先告知陳再道關於趙紫陽不理會、不執行中央決策的情況，從而引起陳再道的同聲憤慨；陳再道繼而表示要對其簽名寫信一事檢討，彭眞表示不用追究，並要之聽從中央（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庚君，北京，2016 年 7 月）。另外可見張愛萍的例子。王震打電話質問張愛萍，何以其發起簽名反對戒嚴，惹得張愛萍反過來質疑王震不懂信件內容和其之外流問題，兩人因而無法進行對話。王震改而延請彭眞出面。彭眞在與張愛萍談話時，客氣婉轉並表示後者動機良好，所以沒有發生正面衝撞（杜導正 2010, 345）。

在彭眞等人的努力調解下，5 月 24 日，楊尙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軍級以上幹部參加）上表示：「七位老將軍就是來龍去脈不清楚，現在明瞭了，表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高瑜 2009, 135）。

柒、中共鎮壓之前與其後的彭眞

一、在「六四」的前夕

彭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 5 月下旬協助中共中央化解可能爆發的院（國務院）會（全國人大常委會）衝突後，直到 6 月 4 日中共武力鎮壓學生、市民的抗議活動以前，彭眞從事的政治活動，目前所知如下：

首先、彭眞整理、修改其在 5 月 26 日對黨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講話內容，並在 5 月 30 日的《人民日報》首版刊出（彭眞 1989）。1997 年彭眞去世以後，中共官方對彭眞此一講話評價甚高：「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中，他發表了〈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的重要講話，對統一思想、教育群衆、分清是非，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起了重大作用。」（人民日報 1997）但是中共自身主要喉舌的工作人員，在彭眞講話剛剛見諸報端以後，卻不無尖銳的批評。《人民日報》內部人員指出：

> 彭眞在人大，連人大常委委員也不是，在黨內，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爲什麼由他出面邀請黨外副委員長座談？萬里不在北京，難道其他黨員副委員長也統統不在北京？是他們的資望不敵彭眞呢，還是他們不像彭眞那樣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方針（陸超祺 2006, 131）？

也有新華社的編輯質疑：「首先，在憲法裡，連『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名詞都沒有，根本不存在什麼違憲問題；其次，按他（彭眞）這樣生搬硬套，憲法就成了『變戲法』，如此統一思想，只能把思想越統越亂。」（張萬舒 2009, 313）

第二、5 月 29 日，彭眞致信李鵬、姚依林，反映農民的不滿—政府收購農產時壓低價格，有時更沒有給付現款，而用「打白條」、開立收據的方式積欠。他也提到部分國營企業資金困難、甚至連發放工資都有問題。彭眞的主要立意是針對久而不歇的學潮問題，思索如何解決民怨。他表示：「這次首都學潮規模之大，時間之久，與部分工農對我們工作不滿有關」，並建議其所提的事項，「可否作爲緊急和特別問題加以解決」（《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51）。

第三、彭眞參與議論趙紫陽的政治處理。在中共做出首都戒嚴決策至「六四」鎮壓以前，鄧小平爲首的黨國元老已經決定罷黜趙紫陽、另立江澤民爲中央總書記。包括彭眞在內的中共資深要人，皆不滿趙紫陽拒不執行戒嚴決策，並認爲如此

導致問題延宕、情勢惡化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據李鵬的說法，5 月 31 日上午，他至鄧小平住所聆聽其指示。當論及如何趙紫陽問題，鄧小平裁示趙紫陽不能繼續留在中央政治局，並批評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接連中途落馬的中央總書記，各自在用人上「有一個小圈子」（張剛華 2010, 267）。李鵬奉鄧小平之命前去陳雲住處，傳達鄧小平的談話意見。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宋任窮，還有彭眞都在座。根據李鵬所言，衆老皆同意將趙紫陽逐出中央政治局，有的更主張乾脆一道拔除趙紫陽在中央委員會的席位（張剛華 2010, 267）。對趙氏的怒氣沖天，由此可見一斑。

二、「六四」動武和之後

「六四」慘烈的鎮壓局面，恐怕不是彭眞所願見。如前所述，在學潮爆發以後，彭眞甚表關心、憂慮，也曾援引毛澤東的言語，表達反對對學生動武之意。其後，彭眞表態支持鄧小平的戒嚴決定，在黨內、黨外對戒嚴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加以辯護和肯定。彭眞有關的政治作爲和活動，有助鄧小平監政下的黨中央得以名正言順地對首都調兵遣將，進而爲其使用兵力彈壓示威遊行提供了條件。然而，從宣布戒嚴至「六四」鎮壓以前，彭眞的主觀認知和意願可能是：同意戒嚴，藉以借用軍隊維持首都秩序和節制示威抗議，而未至同意軍隊開槍和造成流血的程度。這種政治傾向和認知，從負責貫徹執行戒嚴的楊尚昆和其他高幹身上，都可以看到（許家屯 1998, 90-91；林牧 2008, 268）。

事實上，彭眞在 5 月 26 日對非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亦明確說道：「解放軍決不是來對付學生的」（彭眞 1991, 656）。彭眞的此一講話在 5 月 30 日報紙刊出時，也載有這句話。⑤

相似地，陳雲在「天安門事件」發展過程中，登高一呼支持鄧小平的個人領導和中央制定的戒嚴決策；但根據李銳的分析：「在政治思想上，其實『六四』陳雲是反對開槍的」（丁東訪問、李南央整理 2014, 425）。彭眞、陳雲即便個人可能心存保留甚或異議，卻囿於將「堅守黨性」和「追求黨的最高利益」，等同於遵照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決定，甚至甘於爲之政治背書。6 月 9 日下午，彭眞前赴中南海懷仁堂，與一群中共高幹包括：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王

註⑤ 有論者指稱：6 月 2 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眞、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以及中央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討論，決定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彭眞在會上發言支持（張良 2001, 884-892）。然而，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是否確有此一會議。

震、薄一波，簇擁陪同鄧小平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級以上的幹部。⑥這種集體公開亮相，無非欲顯示其與鄧小平心志齊一、同舟共濟。

彭眞雖僅是一介黨員而已，之後還可以像中顧委主任陳雲一樣參與審閱《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6 月 18 日），更在 6 月 21 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作長篇發言（《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51-454）。顯示中共體制規章和現實運作（特別是「老人政治」和非正式權力的橫行）之間的嚴重差距。

捌、結論

李鵬評價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在平息 1989 年「動亂和暴亂」的貢獻時，特別提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尙昆和彭眞，「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爲國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張剛華 2010, 47-48）。經由正文的爬梳和研究，可以發現：彭眞在首都學潮初期，並未像鄧小平、李先念、王震、李鵬、姚依林等人，生硬、急躁地將學生的陳情抗議看作是政治異端和洪水猛獸。彭眞認爲應對得宜是可以達到消解民怨的目的，他因此一度傾向支持趙紫陽主張的疏導和對話方針。但是隨著天安門抗爭越演越烈、特別是鄧小平決定戒嚴，彭眞即變換立場、加以支持，更在趙紫陽抗命不從的情況下，加入對之聲討的行列。

除了緊密相隨鄧小平的戒嚴決策，彭眞個人在「平亂」上「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建立不朽的功勳」，最主要是他出面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放棄召開緊急會議的主張和行動，如此解除了鄧小平爲首的黨中央的一個重大政治擔憂：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前開會否定「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定性，以及審議撤銷首都戒嚴決策。支持廣場學生的人大常委代表，在「朝中無人」、得不到內應的情況下，縱使繼續公開強烈呼籲召開全國人大會議並獲得各界不小的回響，現實上也已無實踐的可能。鄧小平爲首的黨中央因而可以更無忌憚地重手處理堅拒不退的學生和市民。

彭眞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政治選擇和活動，對於維繫中共一黨專政自是立有

註⑥ 另外，有論者指出：6 月 6 日下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眞、楊尙昆、薄一波、王震，以及李鵬、萬里、喬石、姚依林、江澤民在西山開會，部署立即恢復北京以至全國局勢。彭眞在會上發言主張要針對死傷人數，「作出及時而必要的澄清」，免得任「美國之音」等造謠（張良 2001, 993-994）。然而，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旁證是否確有舉行此一會議。

大功，但是對中共政治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對全國人大的自主性，卻直接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彭眞在卸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前，不無自豪地表示：在其領導下的全國人大，已非往昔的「橡皮圖章」（《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1620）。在彭眞的呵護、照料下，全國人大的制度建設大有進展，其下屬的人大領導成員也受之培育和薰陶，提高對機構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自我意識。「天安門事件」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要領導幹部和不少成員，積極主張該機構承擔責任、發揮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彭眞先前用心帶領、細心經營全國人大的開花結果。如果趙紫陽所言屬實：當彭冲等全國人大要員建議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討論學潮相關問題，彭眞曾示意贊成。可見彭眞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決天安門危機上曾一時寄予重望。

只是彭眞在 5 月中旬後期與鄧小平等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以後，亦由彭眞出面找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幹部講話，進行政治「滅火」。彭眞澆熄的不僅是多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天安門危機中展露的政治膽識和焦灼熱心，他也滅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非常時期試展制度機能和韌性的難得機會。李鵬親歷天安門危機中圍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動向的政治折衝和鬥爭過程，不禁有感：「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必須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手裡，才能認眞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決策，不然對國家是十分危險的。」（張剛華 2010, 352）中共中央在「天安門事件」不久之後就收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治管控（Tanner 1994, 73）。彭眞麾下全國人大的積極有爲，在此後難以復見；「天安門事件」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敢思、敢想，更成絕響。

彭眞在天安門危機中對鄧小平領導的堅貞、堅信，以及對弭平事態的出智、出力，鄧小平都看在眼裡。1990 年 7 月 20 日，他對彭眞表示：「你身體很好，腦子也清楚，有些大問題可以多過問一下。」（《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466）這反映在並肩度過 1989 年的政權保衛戰以後，鄧小平對彭眞的政治信任。1990 年代初期，彭眞對於中共中央強調市場在經濟的主導作用、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入憲，以至貪腐橫生等問題，不是沒有看法，但出於對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和現任中央領導的尊重，彭眞未曾公開表示異議（劉政、張春生 2013, 159），可見其在「天安門事件」後對黨的團結和穩定，尤爲堅持和重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彭眞在全國人大任內對農村基層自治甚感興趣，也力推村民委員會的立法；與「天安門事件」後政治氣氛緊縮、保守的趨勢相左，彭眞在 1990 年代初直接對主管官員耳提面命，催促加速農村基層自治的試行（白益華 2013, 482-491）。驅策年邁高齡的彭眞如此行之的原因，除了上溯其早年的政治見

聞和對基層管理的涉入經驗，以及對「文革」慘痛教訓的記取，彭眞是否有如下的考量：經歷天安門危機後，中央首重集中領導、扶持新主，無暇論及擴大黨內民主；他過去一手培植的全國人大，發展空間又大爲限縮；就只剩農村基層民主可以做些文章。期以如此既可以拉攏國內因「六四」鎭壓而對政府感到疏離的民心，並部分挽回中共政權反對民主的對外形象，同時也可爲他自身留下推動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歷史名聲和政治身影。

*　*　*

（收件：107 年 4 月 24 日，接受：107 年 10 月 5 日）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of 1989

Yen-Lin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 were a great political crisis to its rule. During this event, many students and masses gathered in the heart of the nation's capital to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s and grievances towards the CCP, to which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th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finally decided to brutally crackdown on the protests by the force. Peng Zhen had already retired from the important post of senior CCP's Politburo member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before the eruption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However, as an influential old revolutionary, he was still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elding enormous influence and assisting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Deng in coping with the severe political incid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Peng initially supported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s moderat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he student protests. However, after knowing Deng's decision to impose the martial law in the nation's capital, he quickly changed his attitude to firmly stand with Deng, and began to criticize Zhao. Moreover, Peng made good use of his high revolutionary status and prestige, successfully dissuading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NPC's Standing Committee from convening the emergency meeting before the scheduled time to independently handle the student protests. Peng's efforts assisted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Deng in putting the NPC's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 its tight

controls; therefore, Deng and his loyal followers could adopt their wishes of using a heavy-handed-approach to put an abrupt end to the protests. Peng helped the Party Center pass through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1989 to maintain it rule. However, Peng's actions also seriously damaged the increasing autonomy and authority of the NPC, whi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building when he was the head of this political organ.

Keywords: Peng Zhen,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of 1989, Deng Xiaoping, Zhao Ziyang

參考文獻

《王震傳》編寫組編，2001，《王震傳》，下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Wang Zhen zhuan bianxiezu ed. 2001. *Wang Zhen zhuan*, Vol. 2 [*Biography of Wang Zhen*, Vol. 2].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2011，《李先念年譜》，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Li Xiannian zhuan bianxiezu, and e yu bianqu gemingshi bianjibu eds. 2011. *Li Xiannian nianpu*, Vol. 6 [*Chronicle of Li Xiannian's Life*, Vol. 6].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李先念傳》編寫組編，2009，《李先念傳（1949~199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Li Xiannian zhuan bianxiezu. 2009. *Li Xiannian zhuan (1949~1992)*. [*Biography of Li Xiannian (1949~1992*)].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2007，《彭眞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and You-ru Tian. 2007. *Peng Zhen zhuanlue* [*Brief Biography of Peng Zhen*].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彭眞傳》編寫組編，2012a，《彭眞年譜》，卷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ed. 2012a. *Peng Zhen nianpu*. Vol. 5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5].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彭眞傳》編寫組編，2012b，《彭眞傳》，卷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ed. 2012b. *Peng Zhen zhuan*. Vol. 4 [*Biography of Peng Zhen*, Vol. 4].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丁東訪問、李南央整理，2014，《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Ding, dong (interviewed), and Nan-yang Li (recorded). 2014. *Li Rui koushu wangshi* [*Li Rui's Oral Account of Past Events*]. Hong Kong: Dashan wenhua chubanshe youxian gongsi.

人民日報，1989，〈萬里委員長在滬發表書面談話〉，5月28日。 Renmin Ribao. 1989. "Wan Li weiyuanzhang zai hu fabiao shumian tanhua"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Wan Li's Published Written Talk in Shanghai]. May 28.

人民日報，1997，〈彭眞同志光輝戰鬥的一生〉，5月3日。Renmin Ribao.1997. "Peng Zhen tongzhi guanghui zhandou de yisheng" [The Glorious Militant Life of Comrade Peng Zhen]. May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04. *Deng Xiaoping nianpu*

(1975~1997) [*Chronicle of Deng Xiaoping's Life (1975~1997)*].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5，《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05. *Chen Yun zhuan* [*Biography of Chen Yun*].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王敬德，1989，〈趙紫陽分析當前國內形勢：現在最需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人民日報》，5月5日。Wang, Jing-de. 1989. "Zhao Zi-yang fenxi dangqian guonei xingshi: xianzai zui xuyao lengjing lizhi kezhi zhixu, zai minzhu he fazhi guidao shang jiejue wenti" [Zhao Ziyang Analyzes the Current Domestic Situation: What Need Most Now is to be Calm and Rational, Exercising Restraint, Keeping Order, and Solving Problems under the Democratic and Legal System]. *People's Daily* (May 5).

白益華，2013，〈彭眞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制定〉，劉榮剛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1卷：482-49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Bai, Yi-hua. 2013. "Peng Zhen yu *cunmin weiyuanhui zuzhifa* de zhiding" [Peng Zhen and the Drafting of Organic Law on Villagers' Committees]. In Rong-gang Liu, ed., "*Zhongguo gongchandang koushu shiliao congshu*, Vol. 1"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ooks Series*, Vol. 1], pp. 482-491.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吳稼祥，2002，《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紐約：明鏡出版社。Wu, Jia-xiang. 2002. *Zhongnanhai riji: Zhonggong liangdai wangchu de yunluo* [*Journal from Zhongnanhai: The Downfall of Two Crown Prin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Mirror Books.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2002，《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眞》，北京：群衆出版社。Li, Hai-wen, and Yan-ling Wang eds. 2002. *Shiji duihua: yi xinzhongguo fazhi dianjiren Peng Zhen* [*A Century's Dialogue: In Remembrance of Peng Zhen, the Founder of Law in New China*].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杜導正，2010，《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杜導正日記》，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Du, Dao-zheng. 2010. *Zhao Zi-yang hai shuo guo shenme?: Du Dao-zheng riji* [*Du Daozheng's Diary: What Else Did Zhao Ziyang Say?*]. Taipei: INK wenxue shenghuo zazhi chuban youxian gongsi.

宗鳳鳴記述，2007，《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Zong, Feng-ming (recorded). 2007. *Zhao Zi-yang ruanjin zhong de tanhua* [*Zhao Ziyang*: *Captive Conversations*]. Hong Kong: Kaifang chubanshe.

林牧，2008，《燭盡夢猶虛：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Lin, Mu. 2008. *Zhu jin meng you xu: Hu Yaobang zhushou Lin Mu huiyilu* [*Memoir of Lin Mu, Assistant of Hu Yaobang*]. Hong Kong: New Century Press.

俞梅蓀，2005，〈趙紫陽領導開創我國經濟法治建設的往事〉，陳一諮、嚴家其、劉青、王軍濤、何頻編，《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137-147，紐約：明鏡出版社。Yu, Mei-sun. 2005. "Zhao Ziyang lingdao kaichuang woguo jingji fazhi jianshe de wangshi" [Past Events Regarding Zhao Ziyang's Leadership in Pioneering i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for Our Country's Economy]. In Yi-zi Chen, Jia-qi Yan, Qing Liu, Jun-tao Wang, and Pin He, eds., "*Zhao Ziyang yu zhongguo gaige: jinian Zhao Ziyang*" [*Zhao Ziyang and China's Reform: Commemorate Zhao Ziyang*], pp. 137-147. New York: Mirror Books.

范泓，2008，《黨內的覺醒者：李昌在中國改革年代》，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Fan, Hong. 2008. *Dangnei de juexingzhe: Li Chang zai zhongguo gaige niandai*, Vol. 2 [*The Awakening Person within the Party: Li Chang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Vol. 2]. Hong Kong: Ming Pao Publications.

高瑜，2009，《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Gao, Yu. 2009. *Wo de liusi* [*My 4th of June*]. Hong Kong: Wenhua zhongguo chubanshe.

張良，2001，《中國「六四」眞相》，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Zhang, Liang. 2001. *Zhongguo 'liusi' zhenxiang*, Vol. 2 [*The Tiananmen Papers*, Vol. 2]. New York: Mirror Books.

張剛華，2010，《李鵬六四日記眞相：附錄李鵬六四日記原文》，香港：澳亞出版有限公司。Zhang, Gang-hua. 2010. *Li Peng liusi riji zhenxiang*: *fulu Li Peng liusi riji yuanwen* [*The Truth about Li Peng's June 4 Diary*: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June 4 Diary*]. Hong Kong: Aoya chuban youxian gongsi.

張萬舒，2009，《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Zhang, Wan-shu. 2009. *Lishi de dabaozha: 'liusi' shijian quanjing shilu* [*A Huge Explosion of History: A Panorama Record of June Fourth*].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許家屯，1998，《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紐約：明鏡出版社。Xu, Jia-tun. 1998. *Xu Jia-tun huiyi yu suixiang lu* [*Memoirs and Thoughts of Xu Jiatun*]. New York: Mirror Books.

郭文福，1989，〈萬里會見加拿大總督時談國內情況，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人民日報》，5月19日。Guo, Wen-fu. 1989. "Wan Li huijian jianada zongdu

shi tan guonei qingkuang, xuesheng yaoqiu minzhu fandui fubai shi aiguo xingdong" [Wan Li Talks about the Domestic Situation When Meeting with the Governor of Canada, and He Stresses that It is a Patriotic Action for Students to Ask for Democracy and Oppose Corruption]. *Renmin Ribao* (May 19).

陳子明，2009，〈我所知道的《經濟學週報》和高瑜〉，高瑜，《我的六四》：11-44，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Chen, Zi-ming. 2009. "Wo suo zhidao de *jingjixue zhoubao* he Gao Yu" [The Economics Weekly and Yu Gao that I Know]. In Yu Gao, ed.,"*Wo de liusi*"[*My 4th of June*], pp. 11-44. Hong Kong: Wenhua zhongguo chubanshe.

陸超祺，2006，《六四內部日記》，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Lu, Chao-qi. 2006. *Liusi neibu riji* [*The Private Diary of June Fourth*]. Hong Kong: Zhuoyue wenhua chubanshe.

彭眞，1989，〈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彭眞同志在部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89年5月26日）〉，《人民日報》，5月30日。Peng Zhen. 1989. "Yong xianfa he falu tongyi sixiang: Peng Zhen tongzhi zai bufen minzhu dangpai fuzeren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1989 nian 5 yue 26 ri)" [Us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to Unify Thoughts: Comrade Peng Zhen's Speech at a Meeting of Some Leading Officials of Democratic Parties, May 26, 1989]. *Renmin Ribao* (May 30).

彭眞，1991，〈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1989年5月26日）〉，彭眞，《彭眞文選（1941～1990年）》：655-658，北京：人民出版社。Peng Zhen. 1991. "Yong xianfa he falu tongyi sixiang (1989 nian 5 yue 26 ri)" [*Us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to Unify Thoughts, May 26, 1989*]. In Peng Zhen, ed.,"*Peng Zhen wenxuan (1941~1990)*"[*Selected Works of Peng Zhen (1941~1990)*], pp. 655-658.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楊明偉，2005，《陳雲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Yang, Ming-wei. 2005. *Chen Yun wannian suiyue* [*Late Years of Chen Yun*].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楊繼繩，2010，《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Yang, Ji-sheng. 2010. *Zhongguo gaige niandai de zhengzhi douzheng* (xiudingba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During China's Reform Era*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廖漢生，2003，《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Liao, Han-sheng. 2003. *Liao Han-sheng huiyilu* (xu) [*Memoirs of Liao Hansheng* (continued)]. Beijing: Jiefangjun chubanshe.

趙紫陽，2009，《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Zhao Zi-yang. 2009. *Guojia de qiutu*: *Zhao Ziyang de mimi luyin*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Taipei: C. T. Publishing.

趙紫陽，2016a，〈在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結束時的講話（1987年11月2日）〉，《趙紫陽文集》編輯組，《趙紫陽文集（1980～1989年）》，第4卷（1987～1989）：181-18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Zhao Zi-yang. 2016a. "Zai dang de shisanjie yizhong quanhui jieshu shi de jianghua (1987 nian 11 yue 2 ri)" [Concluding Remarks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November 2, 1987]. In Zhao Ziyang wenji bianjizu, ed., "*Zhao Ziyang wenji (1980~1989): Volume 4 (1987~1989)*"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ume 4 (1987~1989)*], pp. 181-18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趙紫陽，2016b，〈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1988年2月4日）〉，《趙紫陽文集》編輯組，《趙紫陽文集（1980～1989年）》，第4卷（1987～1989）：277-28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Zhao Zi-yang. 2016b. "Zai gesheng, zizhiqu, zhixiashi fuze tongzhi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1988 nian 2 yue 4 ri)" [Speech at a Meeting of Leading Officials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ebruary 4, 1988]. In Zhao Ziyang wenji bianjizu, ed.,"*Zhao Ziyang wenji (1980~1989)*: *Vol.4 (1987~1989)*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4 (1987~1989)*], pp. 277-28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劉政、張春生，2013，〈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51）：136-159。Liu, Zheng, and Chun-sheng Zhang. 2013. "Cong lishi de jige zhongda guanjie k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de guanxi" [Obser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Mao Zedong at Several Critical Junctures in History]. *Leader*, (51): 136-159.

鄧力群，2006，《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Deng, Li-qun. 2006. *Deng Li-qun zishu: shier ge chunqiu (1975~1987)* [*Deng Liqun's Own Account: Twelve Years (1975~1987)*]. Hong Kong: Dafeng chubanshe.

閻淮，2017，《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紐約：明鏡出版社。Yan, Huai. 2017. *Jinchu zhongzubu*: *yige 'hongerdai' lixiangzhuyizhe de linglei rensheng* [Entering and Exiting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 Alternative Life of the Idealist from the "Second Red Generation"]. New York: Mirror Books.

戴晴，2014，〈備忘「六四」〉，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604/cc04daiqing/zh-hant/，查閱時間：2018/01/17。Dai, Qing. 2014. "Beiwang 'liusi'" [*A Brief Note on "June Fourth"*]. (Accessed on January 17, 2018).

鍾延麟，2015，〈「文革」前彭眞對中共首都的管理：政治方針、領導方式和幹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58（3）：123-153。Chung, Yen-lin. 2015. "'Wenge' qian Peng Zhen dui zhonggong shoudu de guanli: zhengzhi fangzhen, lingdao fangshi he ganbu zhengce" [Peng Zhen and the PRC's Capital Governanc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rinciples, Leadership Style and Cadre Poli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 (3): 123-153.

鍾延麟，2016，〈彭眞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99-151。Chung, Yen-lin. 2016. Peng Zhen he zhonggong dongbeiju zhenglun: jianlun qi yu Gao Gang, Lin Biao, Chen Yun zhi guanxi (1945~1997)" [Peng Zhen's Role in the Disputes of the Northeast Bureau of the CCP and His Subsequent Relationships with Gao Gang, Lin Biao, and Chen Yun (1945~1997)].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91): 99-151.

鍾延麟，2018，〈「改革開放」前彭眞與鄧小平政治關係之研究（1938～1976）〉，《中國大陸研究》，61（1）: 1-29。Chung, Yen-lin. 2018. "'Gaige kaifang' qian Peng Zhen yu Deng Xiaoping zhengzhi guanxi zhi yanjiu"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1938~1976)].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1 (1): 1-29.

Chung, Yen-lin. 2019. "The Oust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 The Roles Played by Peng Zhen and Other Party Elders." *The China Review,* 19(1): 89-122.

Potter, Pitman B. 2003.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nner, Murray Scot. 1994.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China's Post-Mao Law-Making System." In Pitman B.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